

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

符致兴编译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

符致兴 编译

责任编辑：郭 平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字数：272060 印数：1——8000

ISBN 7—5438—0230—9

K·34 定价：4.50元

致 读 者

端纳原是澳大利亚的新闻记者，从辛亥革命前夕至1938年，他在中国度过了30多个春秋。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外侮日甚，内乱频仍，加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端纳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国际知识，及时报道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使世界了解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变化。他那挖掘独家新闻的机警和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不仅使西方同行对他刮目相看，同时也使他得到中国当局的推崇和器重。他结识清朝政府的封疆大吏，熟悉北洋政府的达官显要，先后当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在中国政坛上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作用，使他成为近世以来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少数几个西方人士之一。

此书是1946年春端纳养病期间口述的。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在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如烟岁月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晚年的端纳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他在病榻上讲述的不是人们熟悉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故事，也不是那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的功过，而是他亲身经历或亲耳所闻的中国重大事件的内幕和因由。通过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或线索，我们能够进一步揭开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的某些谜团，了解当时形成的政治格局及其后果。对于想了解或想学习、想研究近百年中国史的人来说，端纳的回忆录无疑是值得一读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端纳毕竟是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记者，他声称自己“不

是共产主义的朋友”，所以他虽对旧中国官场的腐败和虚伪作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但无不带有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他虽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阴谋作了揭露，却是为了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的战略利益。他对人物的臧否，特别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资产阶级顽固立场和观点。至于他对自己身当顾问的作用，未免也有自我吹嘘之嫌。所有这些，读者都是应予以高度注意，并坚决批判的。

本书根据美国哈泼出版公司 1948 年版《DONALD of China》翻译，该书由端纳口述、厄尔·艾伯特·泽勒记录整理。译文力求忠实于原著，但对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字略有删节和修改。本着负责的态度，编译者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及有些诏令、函件逐一核对了原始材料。

符致兴

1991年7月3日

目 录

致读者·····	符致兴(1)
第一章 奔向梦中的东方·····	(1)
第二章 消失了的沙皇舰队·····	(19)
第三章 在香港的日子·····	(32)
第四章 清廷的多事之秋·····	(41)
第五章 中美联盟的闹剧·····	(53)
第六章 偶发的革命·····	(65)
第七章 侦察紫金山·····	(79)
第八章 向南京开炮的外国人·····	(92)
第九章 翘首以待孙逸仙·····	(104)
第十章 英国离弃了清政府·····	(111)
第十一章 孙中山的外国秘书·····	(130)
第十二章 一夜白了少年头·····	(144)
第十三章 揭露日本的阴谋·····	(151)
第十四章 昙花一现的君主政体·····	(169)
第十五章 石油风波·····	(184)
第十六章 历史与戏剧性行动·····	(198)
第十七章 巨人伸懒腰·····	(212)
第十八章 疟疾发作的军阀时代·····	(224)
第十九章 在“胜利”的口号声中·····	(239)
第二十章 张学良的“洋保姆”·····	(254)

第廿一章	日军横扫东北南窥长城·····	(270)
第廿二章	蒋介石的外国顾问·····	(287)
第廿三章	在西安穿针引线的人·····	(318)
第廿四章	战争与告别·····	(339)
第廿五章	惊险、痛苦而又令人欣慰的归途·····	(352)

第一章

奔向梦中的东方

在轮船右方的水平线上，香港渐渐露出它那冷漠傲慢的面孔；左方，伸出中国大陆的一小块弯曲的陆地——九龙，在距港岛半英里的地方隐入海中。

轮船的栏杆边站着一位粗壮的青年人：满头黑发，碧眼炯炯有神，红润的大脸上突出地长着一个大鼻子和刚毅的下巴。他就是原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记者威廉·亨利·端纳。

他一边凝视海岸，一边想：不管往哪儿望去，我见到的都是英国的地方。

他左边的一位男士说：“瞧，那儿有一大片礁石。60年前，在一场中国人称为‘鸦片战争’的‘争执’之后，我们就在那儿升起英国旗。十多年后，我们又把中国佬揍了一顿，那帮穷鬼便把对面叫作九龙的狭长地带给给了我们。当年升旗时，香港还是不毛之地。”

“那块野草丛生、石头成堆的地方，原来是个海贼窝子。”他继续说，“我们到来之前，这个岛屿只有血腥的历史。”

从船首望去，只见一道道红土山坡上，有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穿过。九龙和香港的边缘是繁忙嘈杂的码头，小火轮不时从那里开出来，各种舢板和驳船宛如鸟儿，挤在桅樯如林的大船之间。

面对此情此景，刚才说话的那位男士不禁脱口而出：“香港是英国人冒险精神的不朽丰碑，是实现了的英国殖民统治的理想，它就是英国！”

“那么，哪儿是中国？”端纳问。

那位男士指着九龙的方向。

“那是中国？”端纳问，又冷冰冰地补上一句：“在那边他们要油烹你们？”

“油烹？他们才不呢。他们是要活活剥你的皮！”

“哪儿能看到他们这样干？”

“嘿，到处都可见到。”那男士挥着手臂，划了个大弧圈。

这时，他们的前面露出了太平“山顶”，它的顶部直插海拔1800英尺的薄雾之中。从山脚的维多利亚城起，一排排傍山建筑的漂亮屋宇，把那锥形的山体装点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山上等级分明，相沿成习。”左边的男士说，“越往上，屋子越漂亮，住在那里的人越精明，社会地位也越高。山上当然没有中国佬的份儿。”

“那么谁住在山顶？”端纳问。

“我想是上帝。”端纳右边的一位男士插进来说，接着便走开了。

轮船在九龙靠岸，端纳改乘渡轮赴港岛。他走上雪厂街码头，从此进入人地两疏的陌生世界。阵阵恶臭向他扑来，这股难闻的气味来自汗流浹背、吆喝不停的码头苦力，来自一根根撒满了尿的桩子，来自舢板上变馊变臭的食品和花生油，来自蜗居在东倒西歪的矮屋中的穷人，也来自街道上脏兮兮的小沟。

端纳身穿黑衣服，头戴圆顶黑礼帽，这种不协调的装束很快淹没在闹市当中。他稍微停了一下，脑海里浮现种种新奇迷

人的情景。他接着往前走，不时避开三三两两的轿夫和黄包车夫，漫无目的地走过人流如潮的街道。

街上人头攒动，交臂而过的各种面容时隐时现：有的刚毅庄重，有的傲慢无礼，有的丑陋难看，有的满是伤疤，有的白如象牙，有的圆似鹅蛋，有的不长胡子。从外表上看，他们有的疲惫不堪，有的毫无表情。端纳在一座拱形的花岗岩楼房底下又停了下来。灼热的阳光烤着滚动的人流。在那萎靡不振的华人海洋中，不时涌现朝鲜、日本、波斯、印度、葡萄牙和马来亚人的面容。身穿军服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印度骑兵以及穿着褶迭短裙的苏格兰士兵随处可见。其他一些皮肤白晰的欧洲人则东闪西躲，看来很善于避开任何擦身而过的人或物。

“哪儿是云咸街？”在一个十字街口，端纳向一位身穿白衣的锡克警察问路。这位长着大胡子的魁梧士兵，毕恭毕敬地在他的花头巾上一碰，指着说：“花街那边就是，先生。”

端纳边走边找，来到云咸街下头，这里正是花市。云咸街盘旋而上，通向繁花似锦的太平“山顶”。他开始攀登，见到山坡上有座倾斜的屋宇，上面挂着一个风雨剥蚀的牌子，原来是《德臣报》的英文字样。他在这里停下。该屋宇的阳台俯瞰云咸街，栏杆上的油漆已经卷起或剥落。端纳登上楼梯，走进该报编辑部。

一位蹲在高椅子上的矮个男子跳下来说：“找编辑吗？我就是，叫乔治·哈德·里德。您大概是端纳先生，来得正好。您的写字台在那边。”他指着一张桌子，上面堆着一些发黄的旧报纸，满是灰尘。

端纳走了过去，又转身瞧着这位矮小而神秘的人物。

“你们怎么偏偏请我来？”他问。

里德已爬回那张高大的椅子。他回过头来多是望着大街，而不是望着端纳，大声说：“您问我们的皮特里·沃森吗？他在这里时，我叫他给我找一个人来，不论在哪儿找都行，但这个人必须是个印刷工人，又是新闻工作者，而且还要滴酒不沾，这一点最重要。我说，这几个条件都要具备。四个星期后，他打电报说，我要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这可不，您果然来了，端纳先生。”

端纳感到很惊奇，又觉得很有趣。皮特里·沃森？他记得一清二楚，就是那位外表古怪、风尘仆仆的英国人。前年圣诞节，这位老兄曾来到悉尼《每日电讯报》报社，要求借他一笔款子。当时，端纳是该报的副主笔。沃森说，他是日本神户《记事报》记者，正取道香港、澳大利亚和南非返回英国。端纳请沃森出去吃顿便饭，使他惊奇的是，沃森竟要喝茶。他显然晓得端纳也喝这种饮料。事实上，端纳虽然现已27岁，但仍然戒酒，而且说不定永远如此。端纳记得，沃森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心里在盘算什么。

喝茶时，端纳不断地向沃森提出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沃森谈到日本的政治动乱，还谈到日本人的所谓文化和他们那种漫无边际的偏狭思路。他像久住日本的权威一样，讲得头头是道，满有把握，一口气吹了一个钟头。端纳对此虽无怨恨，但听得好不耐烦。沃森说在他看来，日本人比谁都狡猾和伪善。

“决不能相信他们。”他警告说，“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永远要提防他们。”

他对日本人的恶感与日俱增，这种情绪从不消失。

“喂，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端纳问。

“哎，”沃森回答，“我可以打保票，中国人也是一团糟。这个民族久经岁月，富有智慧，但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沉重的惰性压着他们。他们纵情于财富和污秽之中，只有自负和虚荣心。他们已经落伍。”

沃森停顿一下，接着说：“他们又像一座沉睡的旧火山，潜藏着一股力量。它漠然兀立在那里，让人捉摸不透，让人生气，又让人着迷。”

他饮尽最后一口凉茶，又往下说：“必须有人给予他们精力和勇气。告诉他们哪是顺风，哪是逆风。”

他们回到《每日电讯报》编辑部。应端纳之请，沃森写了一篇文章。此文由端纳加上“太平洋霸权”的标题，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人的野心，指出他们正在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文章写好后，出纳员出去一天仍未归来。端纳把身上仅有的十七先令全交给沃森。这位英国人走后，端纳再也没有见到他。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端纳受聘为墨尔本《百眼巨人报》的政论撰稿人，薪水倒也不低。那时他担任《每日电讯报》记者快有两年，沃森到来之前不久已是该报的副主笔。按照通常的晋升速度，他可望在20年内升为主笔。他爽快地接受《百眼巨人报》的新职才两星期，却收到香港打来的一封电报，请他出任香港一家有名的晚报——《德臣报》的副主笔，而且最后可以担任该报的主笔。这封电报简洁地附上一句：请在墨尔本中华航运公司接洽船票和旅费。

端纳拿着电报，将信将疑。他前往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对一位职员说：“我想人家是在作弄我。”

那位职员向他保证确有其事，并问他准备何时起程。端纳回答以后再说，转身就走。该职员望着他的背影，悻悻地出神。在离办事处的一个街区，端纳稍停一下，然后向柯林斯大街走去，进入《百眼巨人报》社，走到该报主笔的写字台前。

“我想前往中国。”他说，等待对方回答。

那位主笔抬起头来。虽然交往的时间不长，他对端纳还是有所评价：谈吐有条有理，有时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他见端纳悠然地盯着他，并无挑战的神色。

“这是不是有点突然，端纳先生？”他说，“你来这里才不久，我真舍不得你走。我认为这里才是你的用武之地。不过请问，你对中国有多少了解？”

端纳笑了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点离谱。他对中国有何了解？除了沃森讲的以外，他别无所知。答案焉能未卜先知？种种问题，例如代数等等，并不是倒过来运算。一切都是从未知数开始。

“中国可是个用武之地，我要去闯一闯。”端纳说。

当晚，端纳的忠诚朋友，一位驻墨尔本的《每日电讯报》记者，同他在柯林斯大街漫步，劝他别去中国。

“瞧，”他说，“这里有你的进身之阶。在澳大利亚，许多记者都向往老牌的《百眼巨人报》。你能跻身于此，有的是好机会。老兄，我看还是不要此山望着那山高。不论如何，在中国他们会把你煮了的。”

“咳，正是这样我才去那里。”端纳说。

1903年5月，端纳从墨尔本乘船出发，像里德前面所讲的那样，真的来到香港。

里德转回去审阅正在编排的新闻稿。“喝酒有度的人不会出事。”他说，“不过，我倒是很贪杯。端纳先生，这些是伦敦发来的迟到电报，请您看看并加上标题。”未待端纳拿走成摞的电讯稿，里德便埋头工作了。

端纳折回自己的写字台时，堆在最上面的一份电讯稿滑落在地。他刚要俯身捡起，里德说：“端纳先生，用不着您捡起来！”他拍了拍手，大喊：“波依，把那张该死的电讯稿捡起来！”

男仆白发垂耳，拖着辫子。他将稿子交给端纳，彬彬有礼地说：“给您，先生。”

端纳若有所思地走向自己的写字台。

这时，《德臣报》的老板乔治·默里·贝恩刚好进来，目睹了这番情景。他走过去对端纳说：“你才来，很快就会懂得这里的习惯。在热带地区生活，头一条规矩是：别卖力气，有马骑就不要步行。端纳先生，说来你可能不大相信，十年来不论上班或回家，我几乎没走过一步。我觉得轿子虽然颠簸，但还是可以坐的。”

从事新闻工作之前，端纳原是个印刷工人，最初在利思戈《信使报》学会排字。他的父亲，当地一位知名的建筑承包商，是该报的大股东。这位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甚严，硬要儿子学会一门手艺，自食其力。对一个带有这种文化传统，来自勃勃生机的澳大利亚人来说，端纳现已走进的世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节制的世界，它慎重而又荒唐，只要中国出点小事，英美或法国的炮舰便会逆江而上，在那里搅得沸沸扬扬；权宜外交盛行于世，适有所指的炮塔能比钢笔更快地签署许多条约，从而取得梦寐以求的商业利益。在19世纪商业扩张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欧美列强相继崛起。

近代亚洲的第一场烽火，是由鸦片点燃起来的。在早期的鸦片贸易中，荷兰和葡萄牙颇占优势，美国也随之而至。但到最后，英国却因印度大量生产鸦片而支配了市场。分别结束于1842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英国割让香港和九龙，偿付大量屈辱性的战争赔款。1842年战败之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规定英、美和欧洲其他列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这些国家的公民均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在随后的岁月中，

中国经济一蹶不振，政治缺乏自信，一直屈服于列强的炮舰外交。

此外，列强还使用不那么残暴的手段，从古老虚弱的中国攫取租界和其他特权。日本利用这种手段获益匪浅。那些腐败无能的清朝亲王，即中国的统治阶层，只要认为有油可揩，便总是来者不拒，对列强有求必应。

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在中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和政治威信。随着中国战败，所有列强都控制着中国的海关，而英国更是咄咄逼人，势不可挡。各种条约规定，使英国的贸易比其他条约国更胜一筹，中国海关及其所属人员均由英国人统率和安排。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许多年里，强硬的外交政策和精良的工业制品，更加增强了英国人在华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作用是如此瞩目，以致天下的人一想起中国，便会立刻想到英国。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中国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当时有些亚洲部落开始迁徙，最后在中国中部某个地方聚居下来。

端纳来到这个几度兴衰的国家。然而，较之中国即将发生的变革，中国过去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历史便显得逊色多了。

当6月的酷热烤灼香港这块拥挤的殖民地时，端纳才明白贝恩劝他悠哉游哉、放慢生活节奏的用意。空气凝滞，纹丝不动，端纳觉得可以用手将它分开。楼宇屋舍的门窗全都洞开。欧洲人白天黑夜都呆在宽敞的阳台上。在银行和办公室，吊在天花板上的布风扇疲乏地来回摆动。在人口稠密的华人区，不论男女老少都热得不想动弹。他们宛如杂乱无章地挂在街道狭缝中的长布条店旗，半裸地躺在门口和阳台上。

端纳尽量入乡随俗，设法适应呆板而保守的英国人社区的

生活。贝恩推荐他参加排他性的“香港会”。这个俱乐部是座宏伟的建筑，位于市中心。它设有图书馆，网球场和板球场又宽又大，可让殖民地达官贵人享用的东西一应俱全。端纳间或来此度过一个晚上，多数是听而不是参加人们的谈话。

香港会里谈话的内容是橡胶价格、国内新闻、伦敦博览会，以及芝加哥市场上小麦或谷类的行情。中国的事情很少有人道及。那些殖民地官员和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门口的那个国家的政治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闻不问。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钱袋。端纳所在的那家报纸和其他两家日报，即《南华早报》和香港《电讯报》，正好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宁静的社会生活。众议院或参议院里发生的事情，倒是合乎香港的口味。除了偶然的绑票案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效率很高的英国警察系统使这个城市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没有酒吧胡闹、街头斗殴，很少见到荷枪实弹的士兵，跟北方那个令人反感的上海或北京的社会风气大不相同。

端纳觉得自己难以适应香港上层社会的生活。他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个殖民地里，生于英国的人同来自澳大利亚穷乡僻壤的人就是格格不入。他甚至意识到自己的口音与众不同。因此他决定，逐渐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历史。他不像有些熟人那样，一有空便往山上跑，到《德臣报》对过的摆花街跟娘儿们厮混。

在摆花街，大约住有四十位香港最漂亮的姑娘。她们有的满头红发，有的皮肤洁白，金发碧眼，有的则是浅黑型女郎，全是清一色的美国妓女。端纳有时在办公室的阳台上看到这些姑娘穿红戴绿，坐着轿子下山，她们常常叫他出来。有天晚上，

他真的蹑到摆花街，透过明亮的窗玻璃窥见一些姑娘，但他没有进去。

他急于了解中国的求知欲与日俱增。可是香港的条件有限，难以满足他的愿望。他曾一连三天留意三家报纸上的线索，均未见有任何有关中国的报道，连有关这方面的一份广告都没有。他越来越不耐烦。

“中国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他总是这样问。他没有涉足过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皮卡迪利大街或肯星顿花园，但他知道，他想象中的中国不会是这样的胜地。

他对政治深感兴趣，很爱观察人们和政府的活动。这是乃父撒下的种子。他的父亲是个赤手空拳、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当过利思戈市市长，后又荣任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议员。他曾携带年轻的儿子参加多次政治辩论，端纳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在悉尼，由于报道澳大利亚各州结成联邦时议会开会的盛况，他的政治意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乍一看来，中国的政治似乎复杂离奇，好像一团乱麻。清廷坐镇北京，统治中国已两个半世纪，变得越来越专横和腐败。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各级官员人浮于事，他们不学无术，对先进的管理一窍不通，独有本领大肆搜刮，很快就变得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人们对此怨声载道，有些中国人还密谋起事。据说他们有灵丹妙药，可以包治北京百病。端纳听到许多街谈巷议，知道有个名叫孙逸仙博士的人，香港居民称之为“革命傻瓜”。

端纳在香港只有几个月便被中国所吸引。虽然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蛮夷进来，但他决心撬开那些古旧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广州，那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督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其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有天傍晚，端纳走近里德的写字台说：“今晚我要去广州，在中

国走一走。”里德边工作边回答：“有人走过一趟。”

端纳从香港坐汽船逆珠江而上，经过整晚航行，黎明时分抵达广州。这时天色灰白，露气浓厚。有人正在收拾粪便，空气中弥漫着恶臭。端纳步下长堤，听见许多里弄有盆盆罐罐在叮当作响，那是人们往手推粪车倾倒夜壶弄出的声音。

长堤上，牛车、独轮手推车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拖着脚步，半睡半醒。有位衣冠楚楚的外国人向这个杂乱的队伍走来，一见端纳便立即停下。原来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庆丕，端纳好几次在香港会见过他。

庆丕问端纳来此有何贵干，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剪刀和浆糊瓶子而出来活动，实出他的意料之外。

“我来求见两广总督。”端纳回答，他像平时那样直率，边说边眨眼睛。

“约好了没有？”

“约好？到哪里去约？”端纳缓缓地问。

“嘿，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磊斯先生那里去。”庆丕干巴巴地回答，“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到总督。”

端纳盯着他。“英国领事？”他问，“见中国要人，先要向英国领事打招呼？真是活见鬼。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啦？”他又说，他想当天晋见总督，晚上回香港。

庆丕有点生气地说：“哼，那办不到。”他用手杖的圆头轻轻地敲一位中国人的肩膀，边说边走了过去。

端纳乘轿子前往督衙，八点半抵达那里。总督府是个深宅大院，门口有一批仆役把守。他们头戴圆白帽和红羽毛饰，木然地站着。

端纳想进去，他们便咕咕哝哝地说个没完，最后突然指着